

宗教與經濟的張力

——評基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耶儒對話討論會

The Tens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Economy: A Review of the Forum of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Based o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沈路

SHEN Lu

作者簡介

沈路，山東青年政治學院設計藝術學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SHEN L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Design Art of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Email: shenlu1987@163.com

Abstract

The 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Religions Studi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eld a forum of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based o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rofessor Chen Ming and Professor Chin Ken pa took part as keynote speakers, and a number of scholars with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backgrounds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The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two speakers' views reflected two positions in current Weberian research: those following Weber's Model and those departing from Weber's Model. Professor Chin analyzed the tensions in Puritan belief implied by Weber's proposition, and argued that this tension of belief had a dynamic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essor Chen reminded the audience that scholars should note Weber's ideological background—as a German imperialist, liberalist and nationalist in writing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e stressed that returning to Weber's living context would stimulate contemporary scholars' sense of mission. During the discussion, participants had very meaningful debate about whether a community could break away from Weber's Model and what the China model was. Scholars we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what the mode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actually showed in today's China.

Keywords: Weber's model,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ension,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經濟的轉型，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必要面臨一些瓶頸，在尋找出路和答案的過程中，韋伯著作也隨之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與此同時，恰逢我國社會學研究的興起，由於社會轉型的需要和我國社會學研究的復甦，從而引起了中國學界對韋伯研究的熱潮。在韋伯的著作中對中國學人影響最廣的當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該書從文化史的角度試圖解答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文化起源問題。這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凡討論文化與經濟的關係時，常會套用此書思路或受之影響，此種做法常被稱為“韋伯模式”。正如輔仁大學曾慶豹教授所言：“任何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現象都可以套用韋伯模式”。

當下中國，同樣經歷了經濟的崛起和飛躍，基於中國經濟的騰飛，《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能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刺激中國經濟騰飛的文化動力又在哪裡？經濟的高速發展背後是否也有本土文化因素的影響？2019年10月11號在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開展了一場以中西文化與經濟關係為主題，基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著作研究的耶儒文化對談，就以上問題進行了討論。此次論壇由陳明教授（湘潭大學）與曾慶豹教授（輔仁大學）為主發言人，同時謝文郁教授（山東大學）、瞿旭彤博士（北京師範大學）、許家星博士（北京師範大學）、郁喆隽博士（復旦大學）、唐文明（清華大學）等諸位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一、韋伯模式：從天職觀到預選論——資本主義的濫觴

曾慶豹教授先對大陸韋伯研究的學術史做了簡要的回顧，隨之對韋伯思路進行了簡要說明。曾慶豹教授認為韋伯在“新教”和“資本主義”這兩個看似悖離和兩極化的事物上找到了微妙的聯繫點——路

德的天職觀。韋伯的命題推導方式正是基於路德的職業觀而產生的層層漣漪。曾教授從路德的天職觀入手先對韋伯模式進行了概括，演繹了韋伯如何從路德的天職觀到加爾文的預選論再到理性化，進而導致近代理性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整個過程。曾教授強調：加爾文預選論中隱含着基督徒生存中的信仰張力，這一張力是導致資本主義產生的核心動力。

曾慶豹教授認為在韋伯的論述思路中有兩個關鍵主題，分別是路德的天職觀和加爾文的預選論。

1.路德的天職觀

關於路德的天職觀，他認為路德在翻譯中引入“天職”（calling）的概念，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在新教改革中，路德最大的貢獻就是聖經翻譯，曾教授認為路德的翻譯直接影響了整個德文思想。路德的聖經翻譯引起韋伯關注的地方在於路德引入天職概念後，就改變了傳統宗教中聖、俗二分的對立局面。在傳統宗教中宗教事工是聖事，世俗工作是俗事，而路德把“工作”翻譯為帶有神聖意味，具有“呼召”情感的詞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聖事和俗事的界限，弱化了聖、俗之間的階級差異。將“職業”翻譯成“天職”，不僅在信仰上打破了宗教壟斷的概念，在生活上也模糊了傳統宗教中教士階級與俗世階層之間的距離和差異。參與俗世工作與教士一樣來自於神的呼召，不再具有低賤的、物質的、世俗色彩。天職概念的出現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摒棄天主教將道德誡命區分為‘命令’（praecepta）與‘勸告’（consilia）的做法，轉而認為，經營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並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來超越世俗的道德，反而是端賴切實履行個人生活崗位所帶來的俗世義務。”^①

^①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4頁。[Max Weber, *Xinjiao lun li yu zi ben zhu yi jing she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KANG Le &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曾教授認為，我們在理解路德提出的“人人皆祭司”口號時，在考慮到宗教角色平等的層面時，也應考慮到路德的職業觀。在職業方面也是“人人皆祭司”：職業不分高低貴賤，每一種正統的職業在上帝那裡都具有完全同等的價值。人在任何一份有利於社會的工作中都能承載祭司的功能。路德的職業觀隨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近至影響了德國民眾的身份自覺，發動了德國的農業革命，遠至對加爾文宗教倫理思想的影響，繼而影響了整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產生。

然而，路德雖提出了天職觀，而他的職業觀並不是對傳統宗教的顛覆，在韋伯看來路德的職業觀還是偏向傳統主義，雖然天職概念對聖、俗二分的對立狀態進行了調和，肯定了工作的平等性，但路德仍堅持要絕對的服從於上帝的權柄，對工作的態度強調要安於現狀。路德的職業觀深受保羅淡漠世俗名利的思想影響，認為職業是指“人將之視為神的旨意而甘願接收且‘順從’的事”^①，不鼓勵換取更好地工作，或者從事多份工作。世俗工作雖然不低於修士生活，也並不鼓勵在世俗工作上多下功夫，工作仍是謀生的手段。這種觀念經過加爾文的進一步演化後，引導新教改革在職業倫理問題上走向宣揚聖、俗合一觀念。

2. “預選說”中的信仰張力

路德所做的努力為加爾文新教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在職業觀方面，路德僅證明了世俗職業的合乎神意性，而加爾文在此基礎上證明了人在塵世中通過世俗職業增添上帝榮耀的必要性。在加爾文宗看來，神為人類的便利創造了有秩序的世界和有組織化的社會，那麼為了社會利益服務的勞動顯然也是為了榮耀上帝，這也成為加爾文宗的職業倫理的鮮明特色。

加爾文的職業倫理觀雖來源於路德，卻與路德同途殊歸。路德雖調和了聖、俗的差異，但在職業觀上與傳統主義沒有本質差別，而加

^①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第62頁。

爾文則完全背棄了傳統主義的職業觀，在世俗化的路上走的更遠。加爾文如何從路德演化出了不同的職業倫理，其轉折的關鍵點在於他的預選論。

曾慶豹教授在此處重點強調了預選論帶給新教徒信仰生活的張力。正是此張力最終導致了加爾文宗的理性化新教職業倫理。根據“預選論”的思路，人是絕對的墮落，上帝有絕對的主權預先就無條件的選擇一部分人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寵，得到恩寵的人永遠不會失去這一恩寵；而上帝拒絕賜予恩寵的人也就永遠不能得到這一恩寵；任何人為的方式都無法獲得恩寵。那麼，基於這樣的前提，新教信仰中的張力則表現為：對於完全墮落的人來說，永遠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選民身份，只有憑着信心去相信自己已被預選，“唯有被揀選的人能在心靈上了解神的話語”^①。同時，由於信心的強弱不定和其不可見性，人又需要憑借着可見的“上帝恩寵狀態”去確認自己的選民身份。在職業倫理上的表現就是：信徒祇勞動，不享樂，以證明自己恩寵在握。其內在邏輯在於：加爾文宗認為，勞動是一種天職，是榮耀上帝的行為，唯有選民才能做天職從而榮耀上帝，所以勞動變成了印證“恩寵確實性”的唯一手段。加爾文在信仰生活中排除了路德神秘主義的方式，認為只有理性化的信仰方式才確實可靠，主張從世俗生活中去印證個人信仰狀態。信徒只有將自己當做是成就上帝旨意的工具，在生活中合乎理性地安排整個道德生活，在工作中呈現出與上帝合一的狀態（即在工作上獲得上帝的祝福），從而就能確信自己的選民身份。這正是禁欲主義的典型特點。

加爾文宗認為整個塵世的存在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基督徒的世俗生活則是榮耀上帝的具體方式，所以在所有世俗活動上都應榮耀上帝，包括職業。所以，以清教徒為代表的禁欲主義者努力在職業中獲取財富榮耀上帝，在生活中杜絕世俗享樂，當消費的限制與獲

^①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第83頁。

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成就了理性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生活方式。這一思路不僅導致了加爾文宗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理性主義，而且又進一步導致了世俗的功利主義。

3. 韋伯對儒家（儒教）與新教的比較

最後曾慶豹教授簡述了韋伯對儒家（儒教）的看法，以便於“耶儒對話”主題的進一步展開。總體說來，韋伯認為，新教的理性化信仰方式導致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世界其他宗教都具有神秘主義傳統，所以具有神秘主義傳統的宗教文化都無法影響經濟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的理性化模式。而儒家（儒教）不同於其他宗教，他也具有理性化特徵，但由於它跟現實社會的適應性特徵，不具有新教徒信仰中的張力因素，張力是造就改變的動力性因素，所以新教徒由於信仰生活中呈現出的張力——動力，從而呈現出支配世界的行動，改變了社會發展的方向，造就了近代資本主義。而儒家（儒教）更強調對社會的適應，因而在中國也沒有出現近代資本主義，從而反證了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核心觀點：近代西歐的物質繁榮是新教倫理所帶來的特殊現象，在其他文明中都不存在。

二、跳出韋伯模式：基於韋伯的西方敘事和生存語境的思考

在陳明教授的發言環節，陳教授並沒有接續韋伯命題中的信仰張力問題，以及儒家與經濟關係的問題展開進一步深入的討論，而是試圖解構韋伯的知識神話，呼籲學界要擺脫韋伯討論經濟與文化關係的敘事模式，重構韋伯寫作時的生存關切，強調韋伯寫作時作為德國的帝國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的生存事實，認為關注韋伯的生存語境對當代學者使命感的激發更具意義。

1. 解構韋伯的知識模式

陳明教授開宗明義道：“關於韋伯的討論首先要跳出韋伯對經濟

文化之關係的討論模式”。他認為，中國宗教文化有自身的持續性特徵，中國文明也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內在構成形式。就如楊慶堃先生所持的觀點：韋伯將中國民間信仰看作是“功能性神靈的大雜燴”，這種詮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基督教世界的模式為參照物來探討中國文化中的宗教現象的結果^①；現代中國學者仍認為中國社會非宗教的論點也是受了西方宗教觀的直接影響^②。看待中國宗教問題不可直接套用西方宗教概念。楊慶堃教授用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彌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來區分對待中國複雜多元的宗教形式，認為“在中國形式上有組織的宗教不夠強大，並不意味着在中國文化中宗教功能價值或宗教結構體系的缺乏。”^③陳明教授以楊慶堃先生的觀點為依據，即：中國宗教不同於西方宗教有着正式的組織性體系和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的特點，認為，如同討論中國宗教不能套用西方模式一樣，也不可套用韋伯模式（新教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去討論儒家（儒教）文化與經濟的互動關係。

在陳明教授看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雖然造就了一種知識神話，使得如今學界凡討論“經濟—文化”就繞不開韋伯模式，但其本質是對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一套文化解釋，如同馬克思從意識的必然性角度來解釋資本主義一樣。此書只是具有敘事特徵的學理說明。陳明教授認為造成資本主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經濟發展的規律，也有市場運行的法則。韋伯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以他本人宗教文化影響的預設為先，其論證思路是通過社會現象倒追原因的勾連，從而產生的學術探討。陳明認為，這種

^① 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范麗珠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5頁。[C.K.YANG, *Zhongguo she hui zhong de zong jiao*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rans.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7), 35.]

^② 同上，第22頁。“現代中國學者在極大程度上發展了中國社會非宗教的論點。”該論點先是由西方學者如理雅各（Legge）、翟理斯（Giles）、布德（Derk Budde）等人所持守。

^③ 同上，第35頁。

論證方式不免有“先射箭，後畫靶”的嫌疑。

2. 韋伯反向論證的不足之處

陳明教授承認韋伯把人作為靈性的、意志的、主觀的文化存在和社會存在來展開討論的價值。他認為韋伯的價值不在於對資本主義的解釋，而在於在文化中對人的作用和人的行為與世界關係的探討。韋伯對儒教的研究是把儒教看作是其他文明中的宗教作為反例來論證他的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韋伯不自信的表現。當然，陳明教授提到，這種反向例證的形式又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即文化比較，這也是韋伯的學術貢獻。這種文化比較也刺激了各個宗教的自覺反思，紛紛開始從自身的宗教文化着手去討論與經濟的關聯性。以韋伯思路而展開的儒學研究有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為代表，同時還有曾慶豹教授的《從傳統尋找“現代性”——儒學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新馬來人思潮與文化霸權》等著作。

然而，陳明教授認為，韋伯將儒家作為反例進行論證時，由於他對中國文化的不了解，及漢學文獻的缺失，對儒家的理解尚有偏頗。其具體表現為韋伯對先秦儒學與宋明儒學的區別沒有感知，韋伯對儒家關於“天”的認識也缺乏感受，所以韋伯只能從倫理學的角度去解釋儒家的問題。由於韋伯身在異國對儒家研究的新材料無法獲得，所以韋伯只看到了儒家的理性化特點，卻對儒家理性的倫理化認識不夠，從而沒有關注到儒家關於“德行”的理性倫理化特徵。

由於韋伯掌握儒家文獻的不足及對中國文化缺乏認知感受，陳明教授認為韋伯關於儒家對資本主義排斥性的反例論證並不充分。所以，陳明教授強調，關注韋伯命題就要關注到他寫作時的生存語境，認清他寫作的初衷是為德國民族和德國的發展進行論證。同時，我們還要關注他作為德國人的西方中心論的目的，而不應在他的文化敘事上過多留戀。

3. 還原韋伯的生存關切

陳明教授一再強調經濟有經濟的規律，有市場的法則，資本主義

的形成有諸多的原因。我們應該關注的是韋伯寫作的處境，而不是把韋伯的文化敘事方式供為神話。閱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是要跳出韋伯的敘事模式，直接進入他的“性命”——更多關注到韋伯作為一個德國人在西方世界的非西方性的邊緣焦慮。這對我們當今學者更有意義。中國當代正需要像韋伯這樣的思想者，我們也正處於和韋伯相似的時代，同樣需要按着中國國情提供一套符合中國文化和處境的方法。若把韋伯置於當下中國的生存語境，面臨中國經濟騰飛的現象需要提供一套文化解讀的話，他肯定不會給出如同新教倫理一樣的解釋方法。我們要看到韋伯為自己國家邊緣化的焦慮，以及韋伯作為一位民族主義者的寫作身份。

但是，至於當今學者該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騰飛現象的文化關聯？擺脫韋伯模式後用“自己的路子”解釋現狀的路徑又是什麼？遺憾的是，由於時間關係，陳明教授尚沒有給出更進一步的論證。

三、跳出韋伯模式何以可能？

隨後的討論環節，諸位與會學者就儒家的超越型、儒家的承載者和儒士生存中的張力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試圖去解答擺脫韋伯模式何以可能的問題。在激烈的討論中逐步呈現出三種路徑：

第一種方式就是陳明教授所提出的重視韋伯寫作初衷而不做過多學理論證的方式，試圖強調學者的民族情懷而忽略“新教-資本主義”之間的學理分析的方式，以此來實現對韋伯知識模式的跳脫。根據陳明教授的論證，當我們在討論文化與經濟的關係的時候，似乎都還是在韋伯模式之中。包括余英時先生的著作看起來是對韋伯的反駁，是對韋伯對儒家不理解的申辯。但是，這種論證還是在韋伯模式之下，似乎當我們在討論文化與經濟之關係的時候，就無法擺脫韋伯模式。陳明認為，應該更注重韋伯著作中人與世界的關係，過濾掉韋伯對資本主義的解釋，追究他作為一個新康德主義者在文化裡面對

人的作用的關注，肯定人的行為與世界的關係；至於資本主義，則是偶然性的。包括在解釋儒士的生存張力時，陳明更多討論的是人對他者，及人對世界的張力關係，比如，韋伯的焦慮來自他與德國，德國與世界的生存關係。

對於這一方式很多學者並不認同。與會學者瞿旭彤認為，韋伯作為一個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新康德主義者，他不僅僅只是為了解釋這一現象，其真正目的是要去改變，正如陳明教授所說“韋伯即有對宗教的拒斥又有對宗教的肯定”。韋伯在一邊“祛魅”的同時也在不斷“加魅”。又如陳明所講的中國文化的延續性，也是在不斷“祛魅”同時“加魅”的過程。中國的儒家聖人傳統和西方宗教傳統雖不相同，不能按西方宗教框架來理解儒家，但兩種文化從文明延續的角度來講，是有共同之處的。那麼，如同陳明教授所言，我們現在需要按照我們的情況解釋當下的事實處境，該處境雖與韋伯時代的事實處境不同，但韋伯的解釋方法或許對我們有幫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可能完全置韋伯的知識模式於不顧。

謝文郁教授進一步補充道：韋伯關注到的基督徒信仰中的張力其實正是“聖-俗”之間的張力。在新教中由於“天職”概念的引入，一個從事世俗工作的人既是聖者（選民）又是俗士（從事世俗活動的人），且選民身份需要世俗活動來加以確認。那麼，在新教徒信仰中就會有“聖-俗”兩種力量的拉扯，正是這種在一個信徒身上的兩種相互拉扯的“聖-俗”張力促使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而在儒家文化中，是否同樣存在這樣的張力？儒家也區分君子和小人，如同前新教時代一樣有“聖-俗”的差別。論語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在賺錢方面君子和小人相對立。在儒商群體的生存中是不是也打破了“聖-俗”二分的模式？儒商的生存中是否也存在如同新教徒一樣的“聖-俗”張力？

由此，第二條路徑在謝文郁教授的發言中逐漸清晰起來：關注生存張力，通過對比新教徒與儒生的生存張力的認識，走出自己的模

式。謝文郁認為，韋伯提到的張力問題是導致經濟發展走向的關鍵問題，只有把張力問題演算清晰，才能真的走出韋伯模式。在韋伯的論證中，新教徒信仰中的“聖-俗”張力產生了資本積累進而導致了近代資本主義。不過，此張力進一步發展，理性化無限擴張後，卻導致了另一困境：使資本主義進入鐵籠狀態。而在這個鐵籠中新教精神卻已經逃走，如韋伯所說：“宗教的根基逐漸枯萎，並且被功利的現實執著所取代。”^①那麼，我們討論的關鍵就是要專注新教信仰中的張力。如果對這個個體張力沒有進行充分討論的話，就會淪為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討論。個體內部的動力性張力會直接導致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比儒家文化中是否有同樣的張力——可以作為新的動力把經濟引入另一條可以擺脫“資本主義牢籠”的路。只有擺脫了資本主義牢籠，才算真正擺脫韋伯模式。不然，我們就只有跟着“西方模式”繼續發展。

儒家學者許家星對於儒家的張力問題進行了回應，認為儒家雖然是“聖-俗”兩分的，但又是“聖-俗”一體的。儒家學說中強調“士”的使命是仁道，至於謀利並不是最重要的事。對於百姓來說，需要給予一定利益引導，正如孔子所說“庶之富之教之”的次序，有其邏輯安排在其中。然而，儒學同時又強調內外一體，即：神聖與世俗的當下一體性。如《中庸》裡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對於儒家致力於道的人來說，聖、俗之間的對立感不像基督教如此之強。關於儒家與基督教的掙錢觀念，許家星也指出：對新教而言，掙錢是目的，而對於儒家來說掙錢是手段，目的是為了謀生，這一點與新教有本質不同。

根據許老師的回應，儒家對於“聖-俗”的觀念猶如李澤厚先生所說的“一個世界”，在社會分層上有聖、俗的區分，在求“道”過程中是合二為一的存在。由於在儒生的生存中“聖-俗”的張力並不

^①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80頁。

像新教徒的“聖-俗”張力有一個時間性的過程演變，即：先由“聖-俗對立”發展到“聖-俗融於一體”的過程。加之儒士對金錢追求的淡漠性，儒家倫理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落入資本主義牢籠，似乎缺少個體生存中的動力性張力。所以，在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時，影響中國經濟走向的文化因素究竟是什麼？中國經濟成功背後的特殊性在哪裡？諸如此類的問題，儒家學者仍未給出更好的答案。

曾慶豹教授提出了第三種路徑：延續新馬克思主義的路綫。曾慶豹認為，在之前的討論中似乎存在一種現象：規避新教倫理就沒辦法與韋伯開展對話，沒辦法跳出韋伯模式。新馬克思主義對韋伯的討論則是一種接續了韋伯的結論，但又不觸及新教的一種方式。例如：法蘭克福學派即受到韋伯文化批判和社會學的啟迪，卻不陷於對新教倫理的探討。他們接收韋伯“價值理性正逐漸為工具理性所取代”的觀點，認為批判理性正逐漸為工具理性所取代。工具理性所導致的文化是一種手段文化，而不是一種目的文化。從而導致注重實現結果的方式，而不是該結果本身的社會現象。法蘭克福學派從韋伯的結論開始，繼續討論，而不是從韋伯的問題開始。郁喆隽教授也在此觀點上進一步論述了自韋伯之後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第二次斷裂現象。這樣的路徑雖然既可以規避新教也可以不討論儒學，但這又好像違背了探討當代經濟—文化之互動關係的初衷。

總結一下。陳明教授一再強調關注韋伯的個體生存，不去關注韋伯所討論的新教徒的生存張力及其與資本主義之關係。他所推舉的楊慶堃先生在閱讀韋伯時，也關注到了基督徒的生存張力，並提出“儒者沒有驅使他根據上帝的道德命令來改造世界的這種感情上的緊張性”^①問題。他同時也認可了韋伯的問題意識，認為韋伯對中國宗教

^① 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50頁。[Max Weber, *Zhongguo de zong jiao: ru jiao yu dao jiao*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KANG Le &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350.]

文化與經濟的陳述雖不完美，沒能給人一個滿意的回答，但該問題仍有價值，需要進一步解決。

其實，討論韋伯模式與脫離韋伯模式實質上並無衝突，討論韋伯模式是為了走出韋伯模式。這正如謝文郁教授所說：今天討論新教倫理中的張力就是為了尋找我們文化中可以獲得改變社會的力量在哪裡？不同文化動因會影響經濟發展不同的發展方向，新教動因最後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牢籠，我國市場經濟背後的文化動因是什麼，能不能幫助走出牢籠。不跟着西方模式走向工具理性的道路，是本次討論的主要目的。

因此，完全脫離韋伯模式似乎並不可能，因為韋伯提出了一個社會發展無可迴避思考的命題，如今學界也需要解答這個命題。關於中國社會結構和功能問題的討論，以及宗教與相關聯的經濟發展之間的研究都是由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首次提出，並用以佐證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著作中的觀點。所以韋伯作為學術史的源頭，註定成為一個不可繞過的人物。全然擺脫韋伯模式絕無可能，但我們可以在他的問題意識裏去尋找更精準的答案。當然，關於中國經濟背後的文化動力是複雜而交融的，如同中國文化從晉代開始就開啟儒、釋、道三者交融一般，難以如西方宗教一樣有如此清晰的邊界。所以，討論中國經濟背後的文化動力乃是一個大課題，一次學術討論不可能將所有問題全部窮盡。正如楊慶堃先生所說：“韋伯的陳述在今天看來，或許不夠精確，但是他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進行研究的方法，對於那些有意於對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作範文化比較的人，仍然是個新鮮的挑戰。”^①今天這個挑戰依然存在。

^① 楊慶堃：《導論》（附錄一），載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美惠譯，第349頁。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Weber, Max. *Xin jiao lun li yu zi ben zhu yi jing she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KANG Le,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Weber, Max. *Zhongguo de zong jiao: ru jiao yu dao jiao*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lated by KANG Le,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范麗珠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YANG, C. K. *Zhongguo she hui zhong de zong jiao*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ranslated by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楊慶堃：《導論》(附錄一)，載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28-365頁。[Yang, C. K. "Introduction." In Max Weber, *Zhongguo de zong jiao: ru jiao yu dao jiao*. Translated by KANG Le, JIAN Huimei, 328-365.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